

上 编

# 中国社会分层

## 结构的变迁



## 第一章 5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

### 一、现代化国家社会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现代化必然造成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或者说，社会分层结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的变迁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今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分层结构。那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分层的演变究竟是会类同于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变化呢？还是会因国情之不同，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分层结构？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传统的贵族与平民的身份制度演变为雇主与雇员的阶级分层制度。由传统的身份分层制向阶级分层制的演变，是西方国家现代化中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主要特征。欧洲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具有很强的身份制分层色彩。比较典型的，如英国有绅士与平民之间的重要区分。绅士包括上至国王、贵族（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下至骑士、骑士扈从、普通乡绅的复杂体系。绅士虽然财产数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般都有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力，因而与其他人有明显的差

异。据统计，在 17 世纪初英国绅士大约占全部人口的 2%。<sup>①</sup> 再如法国的三个等级的分层制度，即教士与贵族分属第一、二等级，其他的农、工、商、城市平民等均属第三等级。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身份制度。工业革命后，历经了上百年的变迁，欧美社会均演变为以资本、财产的所有权为基础的雇佣制社会。对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卡尔·马克思曾预言：雇主与雇员会分化为两大阵营，整个社会会两极分化。然而，这种预言只实现了一半，即从一方面看社会上的多数从业者确实处于不是雇主就是雇员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地位，当然不排除有少数的“自我雇佣者”（self-employed）。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无论是雇主阶级还是雇员阶级都具有复杂的分层体系，并且互相交织在一起。雇主与雇员的名称并不能反映阶级的分野，一位大公司的高级雇员其地位大大高于一位小业主的地位而不是相反。因此，社会并没有因雇主与雇员的区分而两极分化，反倒是传统的贵族与平民制的社会更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

第二，农业劳动阶级的衰落和工业劳动阶级的兴起。这一点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了。目前的西方国家，无论我们称之为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都是工业或新兴工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农业就业者仅占很小比例。一些国家的农业就业者占全社会就业者的比重为（1988 年）：美国 3%，英国 2%，法国 7%，联邦德国 4%，意大利 10%，加拿大 5%，澳大利亚 6%，日本 8%，而我国为 60%。<sup>②</sup> 可见，我国的现代化程度较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尚有很大距离。

阿萨·勃里格斯著，陈叔平等译：《英国社会史》，130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sup>②</sup> 见《中国统计年鉴》，823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第三，职业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工业社会使人口最大限度地纳入了正规的职业体系，甚至连以往以家务劳动为主的妇女也不例外。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地位已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都通过职业地位而比较精确地反映出来。再者，职业地位不仅仅反映了经济、财产、收入地位，而且反映了人们在权力结构和声望分层中的位置。这样，职业分层与阶级分层也就是相互吻合的了。不仅如此，由于绝大多数人是通过教育渠道而进入到职业结构中来的，这样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就成为筛选社会分层的最主要机制，尽管这种机制最早并不是发源于西方社会，而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第四，白领阶层在人数和比例上均超过蓝领阶层。在 19 世纪末以前，欧美社会中的白领雇员还只占就业者的很小部分。例如，1851 年，英国受雇的白领职员仅占当时劳动力的 0.8%，<sup>①</sup> 到 1870 年美国的白领阶层总数也只有 75 万人。<sup>②</sup> 然而，自 20 世纪初以来，随着大的垄断组织的兴起，白领队伍开始膨胀起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白领阶层更迅速扩大起来。例如，在美国，白领人员的总数从 40 年代的 1608 万人上升到 70 年代的 5105 万人，白领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也由 40 年代初的 31% 上升到 1979 年的 50.9%。从那时以来，白领阶层就一直在人数和比例上超过蓝领而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群体。从社会后果看，白领的上升和蓝领的下降使得西方国家早期的那种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与斗争无论在声势上还是在激烈程度上都大大下降。白领阶层的兴起也使得整个劳动群体参

① 详见 David Lockwood: *The blackcoated Worker*. P. 36,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② 见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P. 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与管理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与整个社会民主程度、平等程度的提高都是同步发展的。

第五，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这一特点与上述的白领阶层的兴起密切相联。暂且不说理论家们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有着何种不同看法，人们对这样的事实却是有目共睹的，即在经济发达国家，居于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它成为社会的主体。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一直在上升。例如，在美国，到了 80 年代，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 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 6.2%，其余的 87.1% 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等收入或曰中产阶级的地位上。<sup>①</sup> 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

第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消费品能够被大量生产出来，日常必需品已经变得价格低廉，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这就避免了因争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发生的社会冲突。

第七，严格的税收制度缓解了贫富分化。目前，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较为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个人收入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度，即收入越高，纳税的比例就越高。因此，个人所得税制度实际上将富人的一部分财产转移给了穷人。例如，根据美国官方统计，1982 年，美国近 150 万低收入者获得了总数 500 亿美元的公共援助，如果换算成税收，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平均贡献了 250 美元给穷人。<sup>②</sup>

李强：《关于中等收入层问题的研究》，载《管理世界》，1992（6）。

② 李强：《中国扶贫之路》，319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第八，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其内容包括：贫困线制度、失业救济制度以及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制度。以英国为例，伦敦经济学院的 David Piachaud 博士等曾将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总结为：国民保障、与收入相关的保障和非捐助型保障三大体系。请看下表（表 1-1）<sup>①</sup>：

表 1-1 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 年）

三大体系	项 目	接受者人数 (千人)	金 额 (百万英镑)
国民保障 (不做个人 经济状况调 查)	1. 退休养老金	9910	25503
	2. 失业救济	715	1838
	3. 病弱者救济	1490	5138
	国民保障总计 *		37365 *
与收入相关 的保障(做 个人经济状 况调查)	4. 收入支持	5320	14461
	5. 住房福利	4315	7348
	6. 家庭贷款	420	864
	收入相关保障总计 *		24446 *
非捐助型保 障(不做个 人经济状况 调查)	7. 儿童福利	家庭数:6896 (儿童:12485)	5767
	8. 残疾人生活津贴	935	1905
	9. 照料津贴	765	1458
	非捐助型保障总计 *		12323

\*表中的各项总计英镑数额均大于各分项之和，原数据如此，可能是还有其他未列入项目。

从表 1-1 可以看到，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口数是相当大的，特别是使弱者得到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结果是大大地缓和了上下层之间的社会矛盾。

<sup>①</sup> David Piachaud 与 Richard Silburn: 《英国的社会保障及贫穷现象》，载《扶贫与就业》，83 页，香港社会保障学会，1994。

上述 8 个特点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从时间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传统的身份分层制向阶级分层制的转变，人们的等级关系被新式的雇佣关系所取代。在这一时期，工业劳动者阶级兴起，阶级之间的关系处于比较激化的状态，阶级斗争频繁发生。第二阶段则以白领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兴起为标志，全社会的阶级关系处于比较缓和的状态，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调节避免了阶级矛盾的激化。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等人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来总结后一阶段的特征。<sup>①</sup> 所以，如果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如何使社会结构的演变，尽快地从第一个阶段的矛盾激化时期转入到第二个阶段的关系缓和时期，这应该是发达国家结构演变给我们的基本启示。

## 二、50 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上述西方发达国家的演变有何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呢？一方面，我们在目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中，或多或少地发现了上述发达国家结构演变的最一般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的结构变迁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50 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它经历了打碎阶级体系的尝试；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经历了由身份制分层向经济分层的转换。本章以下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这两次转型做出分析。本节先对这两次转型做出总体判断和理论分析；第三节主要研究阶级体系打碎以后的身份分层现象；第四节主要研究 1979 年改革以后，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3~4 页，商务印书馆，1984。

身份分层的衰落和新的分层体系的形成。

1949年革命的最主要特征是在中国打碎了阶级体系。这是通过两个重大步骤完成的。第一步是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用革命的手段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把它平分给农民，从此，中国农村中已不具有真正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第二步是发生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用“低额利息”赎买的方式，改造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用城市中的私营企业先变为“公私合营”的方式，后来又逐步变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用渐进革命的方式剥夺了资产者的所有权。因此，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实际上都已不存在真正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

既然阶级体系打碎了，大家都不占有巨量财产或大规模的生产资料了，那么，财产所有权就难以作为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了，中国是否就因此进入“均等”社会了呢？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财产所有权只是形成群体之间差异的一个方面，可以区分群体差异的方面还有很多。按照帕金（Frank Parkin）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理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sup>①</sup> 中国的情况恰如帕金所言，当财产所有权不再成为“社会屏蔽”的条件以后，立刻出现了其他条件取而代之。这些条件例如，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到了50年代中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

<sup>①</sup> 福兰克·帕金：《马克思主义与阶级理论》，11~13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

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 1979 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为便于了解“身份制”，首先有必要阐释一下什么是“身份”。在社会学上，马克斯·韦伯最早和最为系统地阐述了身份（status）和身份群体（status group）的概念。韦伯认为：“‘身份’指的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它建立在如下的一种或数种因素基础之上：a. 生活方式；b. 正式的教育过程，包括实际经验的训练或理性的训练，及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c. 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sup>①</sup> 韦伯认为，身份与阶级不同，阶级是由客观经济指标决定的分层体系，而身份是由主观社会评价决定的。韦伯身份概念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强调了身份是主观社会评价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身份有客观生活方式、教育、职业、出身作为基础。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身份基础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规、规范认可的制度体系。

当然，在中国的场景下，身份、身份群体又与韦伯讲的身份略有差异。中国 50 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较多地突出了政治身份，比如，贫下中农、富农、职员、革命干部等。对此，本书第二章“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将有专门论述。

身份地位与经济地位不一样，两者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比如，在当时“右派”或小业主都是身份地位，贫下中农或富农也是身份地位。他们的身份地位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贫下中农有可能比富农的收入高，富农也有可能比贫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身份群体与阶级”，载于大卫·B·格鲁斯基编辑《社会分层》，125 页，旧金山：维斯特尤出版社，1994。

下中农的收入高，无论他们的经济生活富裕与否，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身份地位虽然与经济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同的身份地位却又确实体现了它们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的差异。比如，在 1979 年以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福利待遇、工资级别、入党、参军、上大学、就业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更体现出身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相同身份地位的人生活情趣更为相近，社会交往更为频繁。比如，我们常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同一小圈子中的人通常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身份地位。再比如，相同身份地位的人更容易通婚。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市民一般在市民中选择配偶，农民户籍身份者多在农村居民中选择配偶。身份地位又多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差异，所谓“等级”（estate）是工业社会以前的一种社会分层单位。等级制的特点在于，它禁止各等级之间的社会流动。因此这是一种相当封闭、落后的体制。

身份地位既然有差异，那么，人们是根据什么来区分身份地位的呢？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种多样，比如有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一般来说，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的国家的户口类别、居住地区。当“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时，这显然是用“先赋的”指标来区分社会群体。一个人的父亲是与生俱来的，由此种

标准区分的当然就是“身份群体”。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

身份制突出，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例如，当时农民占到全部人口的 80% 以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将阶级体系打碎以后，财产分层的地位下降，因而身份分层的特征就更为突出了。这种以身份制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具体说来表现为户籍身份、工人与干部身份、干部级别身份和单位身份 4 个方面，本章第三节将对对此有详述。

中国自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身份制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身份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进城务工经商。农民中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sup>②</sup>“官本位制”受到威胁。例如，我们很难判断一个级别很高的但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与另一个级别甚低但利润在亿元以上的乡镇企业，孰高孰低？<sup>③</sup>档案身份已被突破，多种类型单位的出现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如此等等。与此同时，经济分层的特征也愈来愈突出。对于这一阶段分层结构的特点，本章第四节将有详述。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并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

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从前述的世界各国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看，走出这一困境的基本途径就是，尽快使我国从经济分化时期转入白领阶层和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为什么呢？笔者以为：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当然，白领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兴起并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如下的一些基本条件。首先，要有产业变迁的条件，即它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正是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才形成了有规模的中间阶层，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变迁的问题。现代社会中，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职业结构，一个庞大的、不是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形成并扩张起来。第三，和教育有关系。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而在现代的发达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受过

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间阶层的规范。然而，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比如，泰国的有钱人都送子女去国外念书，贫苦人家子女则根本没钱上大学，结果造成了教育上的两极分化。所以，大学不仅可以生产高层次人才，而且还可以生产“中间阶层”。总之，特定的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是中产阶级赖以形成的土壤。

下面，就分别阐述中国社会两次大的转型在结构上所形成的特点。

### 三、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

#### 1. 城乡分割的身份制度

自 50 年代中期，一直到 1979 年，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中国一直实行着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一个人一旦在某地注册了户口，那么，迁居他地就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了。户籍制度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将人们分为两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而所有持农村户口的人均被称为农民，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要改变户籍身份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极难进入其他身份群体。

中国城乡户籍制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1949 年新政权刚建立的初期，中央政府对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控制尚不十分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公民尚有迁居之自由。然而，在 50 年代期间，随着工业化的高涨，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城市，并由此引发了粮食、副食供应，交通、住房、城市服务等诸种问题。于是，中央政府曾先后两次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限制农民流

入城市。一次是在 50 年代中期，中央曾专门为“劝止农民流入城市”发了指示，并从 1955 年 6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经常性的、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二次是在“大跃进”后的 1959 年、1960 年，由于当时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和食品、生活用品等供应上的短缺，中国便开始实行了几乎完全制止农民流入城市的政策。按照当时的规定，全国每年只允许 1.5% 的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即城市户口）。这里面包括一些因工作上有成绩而被提升进城的干部和干部家庭成员，对于一般农民来说是绝无可能进入城市的。这种政策一直实行到 1979 年的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异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从总体上说，城里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乡下人的，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各个方面所享有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所不能比的。例如，仅从城乡消费水平比较看，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大大高于农村居民的，前者为后者的倍数在 2.4 倍到 3.2 倍之间浮动。不仅如此，当时，城市居民还享有其他多方面的福利条件，例如各种食品的补贴、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单位提供的子女教育等等。而这些都是农村居民所享受不到的。这样，当时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模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模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在城乡之间有种种的限制，例如粮票和副食证的制度就是一种很重要的限制。当时，城市居民每月都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粮票等票证，只有凭粮票才能买到食品，也才能在城市中生存。农民没有粮票，因而也就买不到食品，即使他们私自来到城市中，也无法在城里生存下去。当时，农民可以改变自己身份的渠道也并非没有，但却十分

窄小。对年轻的农村居民来说，考学是一条主要渠道。如果一个人通过高考，考入了高等学府，那么，他的农村居民身份就可以改变为城市居民身份。农民称之为“跳龙门”。但是，由于农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真正能“跳龙门”的是极少数。由于农民占到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城乡高低差异很大的体制自然就造成了我国社会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形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没有流动的自由，这就将中国人口中的最大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积极性束缚住了。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原因之一。

## 2. 城市中的社会身份分层：干部与工人

1979年的改革以前，城市中的就业者，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干部与工人。干部这个概念有广义的与狭义两种涵义。广义上，中国对所有的管理人员均称之为干部。这种称谓方式起源于，最初人们将从解放区来的共产党官员称为干部，但后来则被泛化了，人们用它泛指一切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上至国家主席、总理可以称为干部，下至农村的村长、小组长，甚至中小学的班组长也可以称为干部。这是中国广义的干部概念。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作为一种身份群体的干部并不是广义的干部概念，而是狭义的干部概念。狭义上，干部指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个人能进入这种身份的关键是要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而列入干部编制。这种所谓列入编制靠的是一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我国城镇中的正式就业者都有一份由他所在的组织（单位）保存的档案。档案记载着这个人一生的经历、家庭背景、亲属状况等。档案编制身份基本上两类，即干部身份和工人身

份。这两种身份的区分不仅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而且体现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两种身份在工资级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等福利待遇上均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干部编制的待遇要大大优于工人。因此，绝大多数就业者都希望被列入干部编制。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被划为工人身份的人来说，他们是很难转入干部身份的，其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

那么，什么人才能被列入干部编制呢？首先，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凡是由国家正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等以上学历的学生，在按国家计划分配到工作单位后，均可取得干部身份。这样，那些不是由全日制学校毕业的职大、函大、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干部培训班等毕业的学生，他们虽然取得了大学专科的文凭，但却不能直接转为干部编制。其次，根据国家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被聘用到干部岗位上的人，可以是干部编制。但是这种干部指标往往是很有限制的，而且，对于由这种途径进入到干部队伍中来的人往往有较严格的要求。例如，在学历上，常要求有大专以上学历，这样，前述的那些由非全日制职大、业余大学等毕业的学生，就要等待干部指标，有了指标后才能转入干部编制。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从工人、农民、士兵中提拔了很多干部，据统计大约有 200 万人。这些人虽然在干部的岗位上，但还保留着原来的身份，俗称“以工代干”等。这些“以工代干”的人，并不能列入干部编制，而只能仍保留在工人等编制内。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分配给了基层单位较多的干部指标，才逐步解决了“文革”后遗留的较严重的“以工代干”问题。今天，“以工代干”的还有，这就要等待上级分配给干部编制指标，然后才能“转干”。再其次，由部队转到地方上的转业人员列入干